

中国

诗话史



蔡镇楚 著

中国诗话史

(修订本)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诗话史

蔡镇楚 著

责任编辑:马小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

*

200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77,000 印数:1—3000

ISBN7-5404-2482-6

I·1843 定价:22.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自序

中国第一部诗话研究史问世已逾十年，新千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升起，新的学术视野正在对以往的学术成果展开新的挑战。因此，站在新的学术高度重新审视我们这部《中国诗话史》的成败得失，对它加以修订再版，也就非常必要了。

中国诗话，著作如林，卷帙浩繁，历久不衰。据鄙人《中国诗话文献考》著录，流传至今的中国诗话之作，尚存一千四百部左右。面对如此繁复的诗话文献研究资料，这次修订拙著，仍然着眼于中国诗话发展演变轨迹的史的阐述。但除保留初版的基本思想与基本体例以外，广泛吸收了十多年以来诗话研究突飞猛进的最新成果，其中主要是我本人对中国诗话、朝鲜诗话、日本诗话等进行总体研究的学术成果。

诗话研究的学术价值和主要目标，最根本的一点是在于建立有别于“西方诗学”的“东方诗话学”。若干年以来，我从中国诗话研究入手，把学术视野与研究范围扩展到朝鲜诗话、日本诗话与印度梵语诗学以及西方诗学，深感中国诗话乃至东方诗话之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及其所体现的民族文化性格是何等的深厚。比较而言，我认为以中、韩、日三国诗话为代表的东方诗话，具有与“西方诗学”完全不同的审美特性与学术风格：

其一，依名称而言，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以降，东方诗话之作多袭用“诗话”之名。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一千七百部左右的中、韩、日三国诗话之作，以“诗话”名书者多达千部左右。“诗话”之名，陈陈相因，相续相禅，历久不变，是儒家宗法文

化与中国人注重祖先崇拜的文化心理的一种反映。而“西方诗学”著作，自亚里斯多德《诗学》之撰著与传世的前前后后，则较少有人继续沿用“诗学”之名名书者。

其二，依论诗体制而言，东方诗话多为语录体式、随笔体式，无论分卷分门者，均由一条一则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各种论诗条目，长短随宜，应变作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无须严密的结构布局，体制灵活多变。而西方诗学论著，大多是严密系统的理论著作，逻辑较为完整，结构体系比较严密。

其三，依论诗内容而言，东方诗话以诗为主，属于狭义的诗学。其内容大多分为“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两种类型。而西方诗学的论述对象与思想内容，则以小说、戏剧、史诗之类叙事文学为主，名为“诗学”，实为文艺理论之通称也。

其四，依论诗风格而言，东方诗话多属于“以资闲谈”的论诗随笔之类，语言通俗浅近，风格平易自然，侃侃而谈，娓娓动听，饶有趣味；不像西方名牌的诗学著作那样严肃正经，也不像《文心雕龙》那样注重语言的骈俪化，读之令人生畏。

其五，依论诗宗旨而言，东方诗话论诗多遵循儒家风教之旨，以《诗三百》为尚，高扬起“诗言志”与“诗缘情”两面旗帜，论诗重教化，重人品，重含蓄，重意境。而西方诗学大多注重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与艺术技巧，诗学宗旨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各种学说之间往往前后否定、互相排斥，缺乏中国诗学理论批评中那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与思想内容的包容性。

诗话研究的历史，与千年诗话一样悠远绵长。从北宋时代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等诗话类编的编辑到元代方回对宋代诗话之作的考证，从清代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话的著录评鹭到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之论，诗话研究一直成为历代学者关注的话题。然而，真正勒成专著的诗话研究著作，却成于

日本文化时代古贺侗庵的《侗庵非诗话》十卷。是书虽然专论历代诗话之非，在诗话研究史上却为我们树立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日本学者这一历史功绩，至今却鲜为人知，故我有专文评介。

二十世纪末叶，是中国诗话乃至东方诗话总体研究成就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其主要标志有三：一是一批颇有学术分量的诗话研究论著的出版，代表作如日本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の研究》，韩国赵钟业的《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韩国诗话研究》、许世旭的《韩中诗话源流考》，中国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诗话学》《石竹山房诗话论稿》、刘德重与张寅彭合作的《诗话概说》、张葆全的《诗话与词话》，等。二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东方诗话学会”于一九九六年在韩国正式宣告成立，其会刊《诗话学》亦在汉城太学社正式创刊发行。三是“东方诗话学”的崛起与诗话研究专门学术会议的召开，如一九九一年在桂林召开的“首届中国诗话词话学术研讨会”、一九九六年与一九九九年两次在韩国召开的“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以及二〇〇一年将在香港举办的“东方诗话学会第二次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人才、成果、国际学术交流三位一体，形成了诗话研究空前繁荣的学术局面。

诗话的崛起，是中国古代诗歌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诗文化与文学批评专门化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中国儒家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国诗话又衍生出了朝鲜诗话、日本诗话、越南诗话等，因而在世界的东方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东方诗话圈”。这个东方诗话圈，是我们今天从事诗话研究的基本立足点。我们的前辈如徐英先生，立足于中国诗话，而标举“诗话学”，于一九三六年撰有《诗话学发凡》一文；鄙人立足于东方诗话圈，不揣谫陋而倡言“东方诗话学”，不仅撰有《诗话学》一书，还先后撰有《中国诗

话与日本诗话》《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中国诗话与印度梵语诗学》《诗话与诗话学》《诗话研究之回顾与展望》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希图使之能取得与“西方诗学”平等对话的学术地位。而“东方诗话学会”这一国际性学术团体及其会刊《诗话学》的创立与历届“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的召开，使徐英先生与我先后为“诗话学”张目的个人行为，从此转变成为一个集团化、国际化的学术行为。在“东方诗话学”这面旗帜之下，一切有志于东方诗话研究的学者将实现与“西方诗学”的平等对话，逐步改变“西方诗学”独尊于天下的学术局面。

诚然如此，国际学术竞争归根到底乃是人才的竞争。经过前辈学者的努力，道路已经开拓，巨轮已经起航，诗话研究的希望就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这就是我常说的“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优秀的学位论文，为二十世纪崛起的诗话研究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学术境界。诸如韩国全英兰《韩国诗话中有关杜甫及其作品之研究》、张鸿在《高丽时代诗话批评研究》、金姬子《韩国品则类研究》，台湾连文萍《明代诗话考》、中国大陆李清良《略论理学与诗话》《中国文论思辨思维研究》、饶毅《中国诗话与唐宋诗之争》、张红《清代朴学与清代诗话》、蔡静平《钟嵘诗品与古代诗话》、欧海龙《论中国诗话的生命意识》、吴果中《象喻：中国文学批评的艺术生命》等，正代表着新一代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眼光和研究水平，大大开拓了诗话研究的思维空间，是诗话研究的希望之所在。

为了开拓诗话研究的思维空间，我们的研究方法也要更新。我认为，诗话研究不应该局限于诗学的研究（这种研究自然是必要的），还应提倡对诗话作文化学的研究，或作美学的研究、文人心态的研究、审美语言学的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文献学的研究、民俗学的研究、宗教文化的研究，等等。只有将诗话放在一个广阔的学术文化背景中加以系统的研究，使诗话研究方法呈

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才有利于诗话研究思维空间的不断拓展，才有益于区别于西方诗学的、独具特色的“东方诗话学”的诗学文化体系与方法论体系的创建与完善。

为此，“东方诗话学”应当以中、韩、日、越南等国诗话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学术坐标，以儒家文化圈与佛教文化圈相映照的“东方诗话圈”为时空范围，以西方诗学与印度梵语诗学为参照系，运用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地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其学术前景则是相当广阔而辉煌的。

我的学术事业，以诗话为起点。我与诗话之缘，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读书时，成于七十年代初劳动改造之余的读书活动。而我从事诗话研究方面的成功，一是得利于环境之艰，二是得益于选题之功，三是得力于师友之助。八十年代之初，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时，曾带去一部《诗话概论》的书稿。这个选题得到了钱钟书、陈贻焮、邓绍基、刘再复等先生的首肯。于是书稿被推荐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得到刘文忠、宋红、绛云同志的热情帮助。一年后，书稿被退回修改。又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将原来的“概论”改写而为《中国诗话史》，字数比“概论”增加了十万以上。此时，湖南出版界的朋友索要这部书稿，我征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意，将修改好的《中国诗话史》书稿交给了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马小驹先生。

《中国诗话史》是鄙人的成名之作，但初版的《中国诗话史》受当时的学术眼光与写作资料等条件的局限，难免有不少缺陷，也许后人会在其基础上写出更加辉煌的诗话研究著作，但作为中国“第一部”，自然得到了学术界的热情关注。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于病中来信，表示“既喜其问世，且祝其名世”，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十多年以来，国内多部文学艺术大辞典予以称许评介，不少大学的相关学科曾先后用作研究生选修课或必修课之

书。又因《中国诗话史》与《诗话学》列入本学科研究生学位课程体系，而于一九九三年申报全国首届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时，分别获省级一等奖与国家级二等奖，受到湖南省教委与国家教委的表彰。尤其值得书写一笔的是《中国诗话史》流传于国外，被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与梨花女子大学等采用为研究生班的教材。一九九〇年八月，我应韩国中国学会与汉城大学李炳汉教授的邀请，第一次走出国门，开始了我新的学术生涯。当我以第一个中国大陆学者的公开身份登上汉城国际学术讲坛的时候，当国际学术界的朋友与韩国的硕士、博士生热情地请我在《中国诗话史》上签名留念的时候，我仿佛感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种崭新的人生境界。

古人常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从事诗话研究的，因此其中难免存在许多缺陷，有知识的，有资料的，也有研究方法的。但是，我忠实积极，勤学好问，转益多师，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情支持。特别是著名学者郭绍虞、钱钟书、钱仲联、周振甫、徐中玉、陈贻焮、羊春秋、马积高、邓绍基、罗宗强，韩国赵钟业、李炳汉，日本船津富彦、丰福健二，以及同辈学者中的诸多好友，如李安民、莫及、蒋凡、周维德、刘再复、刘文忠、陈祖美、胡明、陶文鹏、莫砺锋、王钟陵、曹旭、马小驹、蔡栋、王林、段班县等。我与他们是文字之交、君子之交，正是他们无私的支持与热情的关照，才成就了我的学术事业。对于所有关爱和支持我的学术事业的师长、亲友与中文系的同事们，我无以为报，惟有借此拙著《中国诗话史》再版之际，谨表由衷的谢忱。此情此心，有如寸草丹枫，令红笺无色，与日月争辉矣。

蔡镇楚识于岳麓山石竹山房

二〇〇〇年三月九日

目 录

卷一 总 论

第一章 诗话与诗话之源·····	(3)
第一节 诗话·····	(3)
第二节 诗话溯源·····	(7)
第二章 诗话的流变与演进轨迹·····	(27)
第一节 诗话的流变·····	(27)
第二节 诗话演进的历史轨迹·····	(30)
第三节 中国诗话与东方诗话圈·····	(32)
第三章 诗话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	(36)

卷二 宋 诗 话

第一章 诗话之崛起·····	(53)
第一节 诗话崛起于宋·····	(53)
第二节 宋诗话的演进轨迹·····	(65)
第二章 北宋诗话·····	(72)
第一节 首批诗话之作·····	(72)
第二节 苏黄诗风与诗话创作·····	(75)
第三节 苏黄诗风的反思与“江西格”批评·····	(88)
第三章 南宋诗话·····	(97)
第一节 诗话创作倾向的转变·····	(97)
第二节 “中兴四大诗人”与诗话创作·····	(112)
第三节 “江湖派”与诗话创作·····	(116)
第四节 宋诗话的压卷之作·····	(120)

卷三 金元诗话

第一章 金代诗话	(133)
第一节 苏学北盛与金源诗风	(133)
第二节 王若虚与《滹南诗话》	(135)
第二章 元代诗话	(140)
第一节 诗话的衰落	(140)
第二节 诗格的复兴	(146)

卷四 明诗话

第一章 诗话之复兴	(150)
第一节 复兴的背景及概况	(150)
第二节 明诗话的时代特色	(153)
第二章 拟古主义诗话	(163)
第一节 明初尊唐之风与诗话创作	(163)
第二节 “前后七子”诗话	(168)
第三节 “末五子”诗话	(176)
第三章 反拟古主义诗话	(185)
第一节 从《升庵诗话》到《逸老堂诗话》	(185)
第二节 从唐宋派到竟陵派	(198)
第三节 其他诗话之作	(203)
第四章 明诗话的创作得失	(213)
第一节 明诗话的两大系列	(213)
第二节 明诗话的理论得失	(215)

卷五 清诗话

第一章 诗话的黄金时代	(224)
第一节 盛况空前的清代诗话	(224)

第二节	朴学之盛与诗话创作·····	(234)
第二章	清初诗话·····	(241)
第一节	宗唐诗派诗话·····	(241)
第二节	宗宋诗派诗话·····	(247)
第三节	神韵派诗话·····	(249)
第四节	王夫之与《姜斋诗话》·····	(254)
第五节	叶燮与《原诗》·····	(263)
第六节	“浙中三毛”诗话·····	(277)
第三章	清中叶诗话·····	(281)
第一节	格调派诗话·····	(281)
第二节	性灵派诗话·····	(291)
第三节	肌理派诗话·····	(302)
第四节	《北江诗话》与《养一斋诗话》·····	(305)
第四章	清诗话的专门化·····	(312)
第一节	地方诗话·····	(312)
第二节	专家体诗话·····	(315)
第三节	名媛闺秀诗话·····	(319)

卷六 近代诗话

第一章	乾坤之变与近代诗话·····	(324)
第一节	乾坤之变与诗风之变·····	(324)
第二节	近代诗话的基本特征·····	(326)
第二章	新派诗话·····	(333)
第一节	新派诗话的崛起及其影响·····	(333)
第二节	新派诗话的代表之作·····	(337)
第三章	旧派诗话·····	(352)
第一节	旧派诗话的论诗倾向·····	(352)
第二节	旧派诗话的主要派别·····	(356)

卷七 现代诗话

第一章 诗话的历史转变·····	(379)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诗话·····	(379)
第二节 南社诗话·····	(384)
第三节 旧体诗话的衰落·····	(386)
第四节 新体诗话的兴起·····	(390)
第二章 诗话史的新变·····	(394)
第一节 鲁迅与《鲁迅诗话》·····	(394)
第二节 郭沫若与《沫若诗话》·····	(402)
第三节 《沫若诗话》与《鲁迅诗话》论诗之比较·····	(409)
第三章 现代诗话发展的新趋势·····	(414)
第一节 诗话向诗学演进·····	(414)
第二节 诗话与美学结合·····	(419)
第三节 中西诗的比较研究·····	(424)

卷八 诗话之整理研究

第一章 诗话整理与研究之历史·····	(436)
第一节 宋元人的开拓之功·····	(436)
第二节 清人的集大成之功·····	(443)
第二章 诗话整理与研究之现状·····	(450)
第一节 诗话整理与出版概况·····	(450)
第二节 诗话研究专论的勃兴·····	(453)
第三节 诗话整理研究的旗帜·····	(456)

总 论

中国，素有“诗国”之誉。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诗歌发展的历史。

在我们这个诗歌国度的皇天后土之中，随着中国古代诗歌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唐诗高峰的崛起，一种新兴的、区别于西方诗学的论诗之体——诗话，在北宋欧阳修时代应运而生。可以说，诗话是中国诗文化的产物。

闻一多先生《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指出：“《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始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从闻一多先生所说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定型于诗，定型于《诗三百》。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坚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就是一种诗文化。

在欧洲，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研究文学理论的著作，一般都称为“诗学”，诸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等。中国则不同，虽然没有划一的诗学，但是研究文学理论的著作却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欧阳修之前，勒成专著的文学理论之作，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旧题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等。自欧阳修始创诗话之体，千百年来，中国的论诗之著大多以“诗话”命名，勒成专著的历代诗话之作，数

以千计。作家云蒸，作品如林，卷帙繁富，汗牛充栋，而且早就走向国门，衍生出兴盛一时的朝鲜诗话、日本诗话等，在世界的东方呈现出一个巨大的“东方诗话圈”，显示出蓬勃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任何一门艺术，总是深深地植根于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沃土之中，打上本民族文化性格的烙印。中国诗话也是这样。它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形成的正是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中国历代数以千计的诗话之著，是一笔巨大的文学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理论宝库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灵光异彩。有如此绚丽多姿的诗歌艺术之花，有如此丰硕的诗歌理论之果，我们中华民族理应为之骄傲和自豪，用不着在西方诗学特别是在现代派所谓“表现”理论面前感到自惭形秽！

五四运动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由于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大多运用西方文学史观和艺术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现象，因此，从未给予中国历代诗话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对这笔诗歌理论批评遗产，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者寥寥无几，非难者却接踵而来。即便是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也大多局限于个别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很少有人对中国历代诗话进行系统全面的宏观研究，诗话研究专著，至今尚未问世。在中国文化史上，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美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美术史……都先后问世，唯独还没有一部中国诗话史。可以说，中国诗话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系统的诗话研究，至今还处于拓荒阶段。

因此，对中国诗话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和研究，继承和发展这笔巨大的诗学文化遗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西方诗学”平等对话的东方诗话学，乃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光荣使命。

第一章

诗话与诗话之源

第一节 诗 话

我们研究的是中国诗话史。

为了把中国诗话放到比较广阔的历史环境和文学背景之中来研究，我们不妨把自己的视野放宽一点，首先探讨一下诗话的概念、特性和艺术渊源。

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诗话是一种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于诗话是什么，它有何特性等，都缺乏恰切的表述。比较富有代表性的说法，一般有三种：

(1) 宋人许颢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彦周诗话》）

(2) 清人吴琬曰：“诗话者，以局外身作局内说者也，故其立论平而取义精。”（《龙性堂诗话序》）

(3) 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清诗话前言》）

这三种说法，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诗话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许颢从诗话创作的内容立论，大体概括了北宋时代诗话创作的主要内容。记得欧阳修始创诗话之际，说他的诗话

创作宗旨仅仅在于“以资闲谈”^①。基于这一宗旨，初期诗话之作大都沿着欧阳修开创的既定路线，以记叙诗事为主，成为“以资闲谈”的记事随笔体式。至许颢所处的北宋末年，情形逐渐变化。许氏总结了当时的诗话创作经验，认为诗话创作以辨析诗歌句法、记叙古今诗事、订正诗歌讹误为主要内容。所谓“辨句法”，是讲诗学方法；“备古今”，是说诗学源流；“正讹误”，是言诗学利病；而“记盛德”，就是指诗学观念了。《易·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所谓“盛德”，旧指美盛的品德。许颢从诗话创作的功利主义观点出发，把“记盛德”作为诗话的一种社会职能，这在当时是颇有权威性的诗学观念。至于吴琬所论，则从诗话作者的角度出发，道出了诗话对诗歌的评说特质。所谓“以局外身作局内说”，正是要求诗话作者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诗歌进行公正的评说，以做到立论平正，取义精当。很明显，随着诗话的崛起，其内容不再限于许颢所标举的，诗话的作用也不再囿于欧阳修所倡明的“以资闲谈”了，诗话之体已经超越了闲谈随笔的藩篱，进入到文学理论批评的宏观领域之中。它的内容，大致包括标举论诗宗旨，推溯诗派渊源，评论诗人诗作，摘赏诗歌佳句，漫谈诗歌技法，记叙诗坛轶事，考证诗歌掌故，诠释诗句僻典等等，凡有关诗歌的内容，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论了。这样，欧阳修“以资闲谈”的随笔体记事诗话，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所以，郭绍虞先生指出，诗话之体“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显然，这是广义上的“诗话”，是演变和扩大了了的“诗话”，是对诗话所作的现代意义上的解释。

这三种不同的解释，都有其依据，如果把它们看作一个系列的整体，则比较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诗话由以记事为主的闲谈随笔

^① 见《六一诗话》卷首题辞。